

范泉

文海
硝烟

文坛漫忆丛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范泉

文海硝烟

坛漫忆丛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春兰

封面设计:陶雪华

文坛漫忆丛书

主编 陈青生

文海硝烟

Wenhai Xiaoyan

范 泉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校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2 ²/₁₆ • 插页 6

字数:280 000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207-04003-2/I • 623

定价:19.70 元

百般滋味的青春年少

苦苓与你携手为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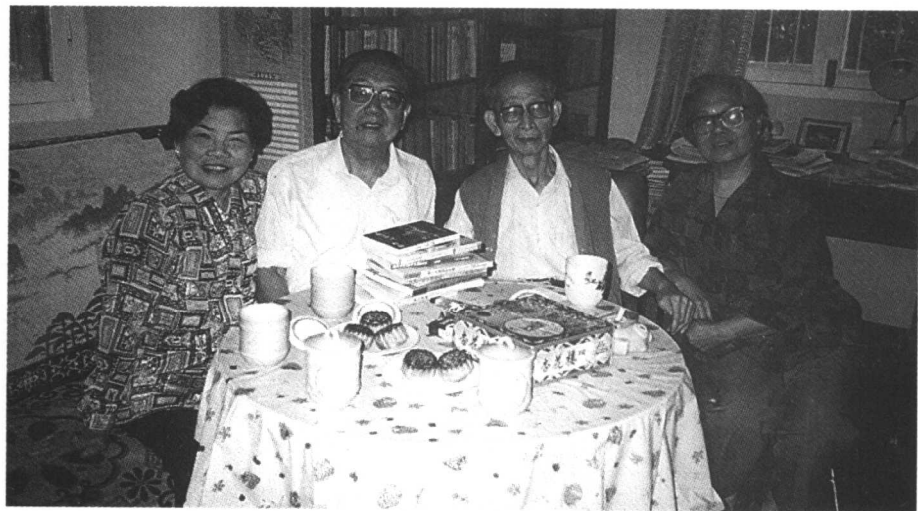
1994 年祝贺巴老九旬寿诞



1986 年在北京访问叶圣老



1985 年与臧克家夫妇在北京



1995 年范泉夫妇与贾植芳夫妇(右二、右一)在上海



1984 年与谭启龙、艾芜夫妇在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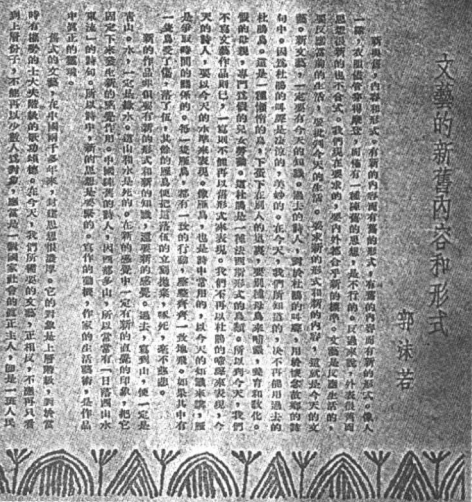
1983 年在许杰家里



1946 年茅盾夫妇出国,我(左一)参加送行(孔另境摄)



1996 年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全书出版座谈会上发言



郭沫若

[illegible]

参阅《往事五题》

范致生 太子曹主 高平公 有监印霜葉
仁伯一月花晨 謝之 監印者向學其 月都如影
友 去年冬印如此事 當先作此值士家 此意 有
廷哲相和

文藏秋女作，收服到謝。手稿連載日前，
不列劫事，未刊時一日，每無事忙，即去前書
都也作，例手為。一時間，方知定中。也。
了國之兒，手為處，明律，然而餘。手，也。
傳定。文過，序也。挽左，並。格，事以。左，手。手。
手，身也。今可，亦日。集，也。代，家。再，手。依，托。致。
引，也。亮，文。陽，手。引。
虎，陽。上，二。

雁上

参阅《一张名片》

國政院軍政委員會秘書長
化學工業部委員會主任委員
郭沫若
沫若
若
一
四川 樂山

四川雄山

奴僕叩

附寄郵費條一幣之檢入

范泉先生：字从豪，豐城臨夜
松隱，感謝之云。現生錢松初過一
巡了，清順拙字一文，且改爲荷。
封面費神設計，甚感，尤公運來教
看，請再裁奪之。

雁水
上
九月十九

向老托尔斯太学习

人

几个月前给冰心大姐写信

強，抱悲自己的处境。我們通信，

短，因为

许多话不需要写出来，发牢

世不用长篇大论，祇讲两三句，她亦

自了或者给我一点安慰或者在

那时我的字秀气

常引起她的共鸣，或者给她带来烦恼。

五、東：遼陽過去和現在

巴老手迹的过去和
现在(参阅《佚诗》文)

病眼寄范渠吳峴

開帘都是霧空濛

讀書苦字少視人分六

家常換黑止水

白障初起者去翳不

即奉

二老雅正并錄
李真雅正
一九七九年六月

季鎮淮
一九二一年十月

謝永之：司馬溫公的知名度，
比陸軍的很大。可是魏若蘭的
事迹，留在史冊上，魏氏卻很
早被世人的遺忘。這真是
造物弄人的一主一也。雖不
知道魏氏在《三國志》又載
着魏氏內應延津橋，女界
英雄，王允用美人計，女界
周郎，再寫述（修我）許久
沒有讀過字文（事），一直
以為根據本史有魏氏事。

中 晚

謝永之

参阅《季镇淮》文

参阅《靳以谈两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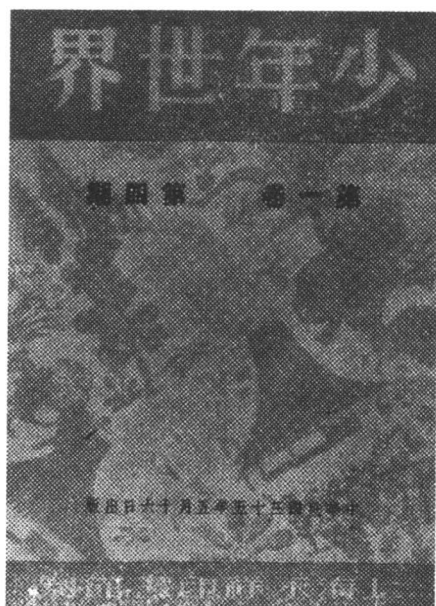
1946 年时的孔另境(参阅《雪压乔林》文)

参阅《我编〈作品〉半月刊》





参阅《一段受尽磨难的坎坷经历》(上下图)



主编者的话

陈青生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风云翻卷，波澜起伏，阴晴变幻，冷暖交替，总是与中国社会大小气候的闷抑舒畅、严紧宽松相随相和。许许多多痴情文学的男女老少，置身这样的境况氛围，分别以生旦净末丑的角色和追求登场献技，舞文弄墨，斟字酌句，布局谋篇，编织出五音交响、七情洋溢的丽文华章，营造了中国文学绵延发展迢迢长程中不乏自豪、也不乏思索的一段历史景象。不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先后将各自的文学生涯和文坛见闻付诸笔纸，寄托对流逝岁月的纪念，也为文坛历史留下了雪泥鸿爪，夕拾朝花。这套“文坛漫忆丛书”，便采撷、辑辑了五位著名作家回忆文学历程，怀念文坛师友，追忆文坛往事的散文精华。

这五位作家，大多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后期开始文学活动，按中国现代文学史界的通常说法，属于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作家。五位作家的文学擅长不尽相同，各人取得的文学成就互有千秋，有的还是中国现代小说、新诗、散文和电影剧作等方面的重要代表，但痴情文学的终生不渝，笔墨生涯的坎坷曲折，文坛交游的见识广博，则是几位作家的共同特点。他们在各自的追怀忆往

中,真实地报告了自己的人生和文学经历,坦露了孜孜追求文学“真善美”极致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成败得失;维妙维肖地再现了许多文坛人物的音容相貌,言谈举止,秉性情趣和品格节操;还力求翔实地披露了一批文坛旧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旁蔓别枝,以及种种外人难知的隐秘情节;加上不同风韵的文采,真挚至诚的情意,丰厚深长的蕴寓,遂使这些文坛漫忆文章,兼容艺术欣赏和史料考证的双重价值。这样的追昔忆往散文,对历史真相真情的展示,往往比教科书式的学术论著更具体、更周详、更生动、更形象,也更使人信服,以至历来获得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喜爱,受到学术研究者的重视。

回顾历史,是对流逝岁月的纪念,也包含对往昔的反思,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有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二十世纪帷幕初启时,中国文学表现出弃旧图新、追融世界文学大潮的高远志向。这以后,中外文学交流的规模愈发扩大,中外文学汇融的程度更趋加强,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境界也更为宽广高大,从而孕育了众多将传统精华和时代神髓集于一体的文学大家,产生了大批魅力隽永、异彩纷呈的文学杰作。但是,社会的连年动荡,时世的多灾多难,又常常使文坛不得安宁,作家被推上各种斗争的风口浪尖,文苑横遭粗暴践踏,一些年间居然成了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如果没有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折腾、磨难、禁锢、摧残,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景象肯定会比现有的更为繁盛绚丽。有一种见解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很有关系。中国古代有人说过,《离骚》、《史记》的问世,很大程度缘于作者蒙受深冤奇辱,身心倍尝苦难。另一位古人也宣称,文学家非经苦难、苦恋、苦闷三境,实难写出动人心魄之作。外国也有类似观点。西洋有人将诗人比作夜莺,认为夜莺的生活舒适便不会鸣唱。东洋有人干脆将文学定义为“苦闷的象征”。苦难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人所难免的生活经历,它对作家人生道路

的择定,对作家思想性情的锻炼,对文学作品外形内涵的熔铸,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将文学佳作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联系起来,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然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也是公认的律理。作家究竟要经受多少苦难才能产生“伟大作品”呢?或者换一个角度设想: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文坛多少年来总在期待和呼唤“伟大作品”却又总未如愿,是由于中国作家经受的苦难尚嫌不够呢?还是太多?其实,“伟大作品”的问世,得之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孕育,非独与“苦难”一因相关。再说,即使“苦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作家饱尝苦难煎熬换取“伟大作品”的产生,也令人觉得过分残酷,这实在有悖于人生本义、人道精神,也偏离文艺原旨,似乎是社会文明落后时代对文学的嘲弄和扭曲。今昔对比,时代毕竟前进了,社会文明毕竟发展了。尽管现在仍难以断言“伟大作品”已经不再需要苦难催生,作家和文坛已经没有苦难等候,但在今天,反对暴戾和愚昧,推崇祥和与安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往屈原、司马迁、鲁迅、闻一多、胡风、老舍遭遇的那类苦难,应该不会在中国文坛再现。“文坛漫忆丛书”的五位作家,在文坛上笔耕墨耘、栉风沐雨的时间,都超过半个多世纪,有的更逾七十春秋,他们的经历见识,也包含对于这一点的印证和祝祷。

二十世纪帷幕关闭在即,新世纪帷幕行将开启,中国文学又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前景光明,任务艰巨。此时,读读历史过来人费心凝血总结的经验教训,听听他们推心置腹的忠言告诫,对我们思考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如何继往开来,踵事增华,争取更健美的的发展,从而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这个课题,是可以得到有益启示的。

在硝烟中拼搏

——《文海硝烟》题记

一九三六年夏，我去了张家口。在张家口的大街小巷里，我亲眼目睹那些印着日本字母的“味の素”广告，到处张贴着。再从张家口搭乘火车，回到北平，只见铁路沿线那些交通要道旁的农舍墙壁上，漆着大幅大幅的“味の素”广告。而到了北平，才下火车，走在马路上，又亲眼目睹一群抬着“味の素”高大模型的中国人，一面敲锣打鼓，大声吆喝，一面向马路两边的行人，散发着一张张印在彩纸上的“味の素”传单。

味の素！

难道这是一般的商业广告吗？有哪一国外商，能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为了宣传他的商品，而可以不顾对象和场合，肆无忌惮地到处乱涂乱贴？难道我们还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吗？

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张家口和味の素及其他》，在《光明》半月刊上发表，呼唤国人提高警惕：日本侵略者的硝烟，正从东北延伸到华北，眼看华北已经开始变色了。

我回到了上海。

一九三七年夏，在洪深和谢六逸两位老师的支持下，我和马良一起，主编了《作品》半月刊。可是刊物才出版第3期，“八一三”的日本侵略者炮火，竟把作品社夷为平地，马良被炸死。当时我去了

无锡乡下刘家庄,幸免于难。但是铁路被炸断,回不了上海。等到我徒步前往常熟搭乘轮船回来时,上海已沦为“孤岛”,和我一起合作的文友邵子南、李雷、丘东平等,早已离开上海了。

一九三九年冬,复旦大学派我到一家由国民党CC系主办挂着洋商招牌的中美日报社,主编一个抗日反汪的副刊。编了不到3年,汪精卫的76号特务机关派人绑架我。我机智地摆脱了“尾巴”,还避开了国民党三青团对我的暗害,但是最终,我还是因为编发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的文章,而以“共党嫌疑”的罪名,被国民党撤了职。

一九四四年夏,在沦陷了的上海,复旦大学金通尹教务长介绍我进了一家创建于清代末叶的民族资本家企业永祥印书馆,要我迎着敌人的刺刀,在日本侵略者的眼皮底下,成立编辑部,筹备出版一批伸张民族正气的图书,并首先以“丛刊”的名义(可以不向敌伪登记),出版一种不定期的期刊《文艺春秋丛刊》。

从一九四四年十月起,《文艺春秋丛刊》陆续出版了《两年》、《星花》、《春雷》、《朝雾》。从一九四五年三月起,每月还出版了一批“青年知识文库”,在第一批六本中,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的《历史研究法》,有中共地下党员、著名导演吴天用“方君逸”的笔名撰写的《编剧和导演》等。这些书刊使长期处身于黑暗沦陷区的知识青年耳目一新,受到鼓舞。但是当第五本丛刊《黎明》刚刚编好时,日本宪兵队的甲斐军曹带了手枪和翻译,到书店的董事长办公室来追捕我。我在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掩护下,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谈判和送礼,终于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得到了解放。

胜利后的中国,百业待兴,文化出版事业也应当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里蓬勃发展。我组织筹备了“大学文库”、“文学新刊”等七大大丛书,并将《文艺春秋丛刊》改为按月定期出版的月刊。与此同时,还出版了另外四种期刊,其中包括由茅盾、叶以群主编的《文